

# 电视节目制作的几个美学原则\*

尹 力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江苏南京 210093)

**摘 要:**电视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其意识形态的本质属性决定它必须要充分展示社会人生美与主体性情美。这就要求电视编创人员,坚持弘扬社会主义主旋律与鲜明的个体风格和谐统一的原则,去阐释社会生活之美,去表现生命之美、理想之美和未来之美。其次,各类电视节目,可以说都是主体对某些物像的切割筛选、删除渲染之后的再生物。因此,电视节目制作就必须要坚持充分展示生活真实美与意象物化美的美学原则。再次,电视是一种大众媒介,这就要求电视工作者深入向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学习,充分发挥电子传媒时效性的动能,及时满足大众对文化的需求。

**关键词:**电视;节目制作;美学原则

**中图分类号:** J9;G2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074(2007)03-0105-06

**作者简介:**尹力(1972-),女,湖南洞口人,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电视吸引人的眼球,在于这个魔盒里装着许多能给人带来各种不同的审美愉悦,提供各类不同需求的节目。节目,可以说是电视传播组织结构中最基本的组成部分,所有电视台都是靠节目来支撑的,有了优秀的电视节目,构成品牌优势,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成为最后的赢家。没有优秀的电视节目,“频道”也好,“栏目”也好,“板块”也好,都将失去存在的意义。所以,对于电视编创者来说,与其心情浮躁地专注于形式方面的突破,还不如沉下心来致力于电视节目精致内容和巧妙构思的追求,在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这两个不同的向度中,找出审美关照的契合点。

## 一、社会人生美与主体性情美

电视是一种社会文化形式,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将电视作为传播意识形态的重要工具。对电视工作者来说,只有首先全面理解并积极面对这一客观事实,才能使自己紧跟时代,融入社会,使节目制作选择好“主体视点”,建构起自己的叙事套路和阐释模式,

形成独特的风格,在对社会人生百态的充分展示中,显现出主体性情的涌动,既有深切的人文关怀,又有鲜明的个性特征,从而使节目生机盎然,有效地“防止叙事结构枯燥乏味”,<sup>[1](P82)</sup>以引起观众的注意和兴趣。

为此,在表现社会生活方面,我们必须对当前电视节目中,出入总是离不开星级宾馆,闲聊一定在高雅的咖啡厅,坐车不是“奔驰”就是“宝马”等,千篇一律的艳丽画面予以矫正。因为不能将这类豪华消费,说成是普通老百姓享用的“日常生活”。在侈靡之风甚嚣尘上的当前,特别是对于社会物质生产分配不甚了了、又不甘愿吃苦的“新生代”来说,电视工作者还是实事求是,多展示一点“朴实”为好,以免消解人的奋进意志,误导坐享其成,滋生骄奢情绪。所以,优秀的生活类电视节目,总是以劳动创造为切入点,在艰难与困苦中展现社会生活美,以突出人的价值与意义。

因为人民推动历史前进,劳动孕育历史创造。劳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创造价值的源泉,而价值则只有通过脚踏实地的艰苦奋斗才能得以实现。所以,在镜头对

\* 收稿日期:2007-03-23

准今天并不富裕、但物质慢慢多起来的生活,展示社会劳动成果之美时,更需要挖掘出人民在创造这些财富时那吃苦耐劳的精神,充分显现人民在劳动过程中,那不畏艰难困苦、勇于拼搏进取的思想境界之美,从一般说明美“是这样”,上升到阐释美“为什么能这样”的哲理高度来认识和理解问题,这才是电视工作者的社会责任和艺术造诣的终极目标,也是电视节目制作的美学原则。只有当电视编创人员自觉将主体性情的表达与群体的存在联系起来的时候,自己才能不孤立于社会之外;只有当电视节目将弘扬社会主旋律与鲜明的个体风格和谐统一起来的时候,节目才会被社会所接受而成为高品位的艺术精品。

其实,这一点早已成为我们电视工作者的共识,这类高品位的电视节目也不胜枚举,先请看1996年上海台播放的纪录片《薛范的歌》,它报导了薛范除译配外国歌曲1600多首,编辑出版歌曲集30多种外,还撰写了大量的音乐理论、音乐美学等文章的事迹。编创人员从独特的角度,切入对薛范生活美的展示,匠心独运地以大量的镜头,对准译配这些歌曲后面的磨难、抗争与奋进,用火一样的激情,诠释这些素材的深层底蕴,颂扬主人公的自强与自立,生动地说明“优秀需要苦难,美是艰难的”这样一个深刻的人生哲理;诚恳地告诉人们:社会生活之美,全在于奋斗、奉献和创造。这就是一种深切的人文关怀,这就是电视节目要坚持的一个美学原则。还有2006年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播出的《我的长征》这个节目,据主持人崔永元说,创制的目的是为了弘扬民族精神。的确,这支由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经历的人所组成的“重走长征路”的小分队,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团结、乐观、吃苦耐劳、坚忍不拔的精神,以及一路上所开展的各种公益活动,深深吸引着观众,感动着观众。节目中那一组组现场采访录制的、散发着风土人情芬芳、蕴含着顽强奋进生活旨趣的镜头,寓意极其深远地将历史、现实、未来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从当年红军的长征精神,现在小分队长征之旅的意义,以及人人心中那无比壮丽的“我的长征”憧憬,在这三个不同层面上,引导受众去理解和思考问题,这样的节目策划,本身就是一个很有价值的艺术创造。

是的,人生就是一条永不停步的长征之路,途中有许多艰难与险阻。但是,只要我们相互理解与尊重,对受难者伸出援助之手,对不幸者给予关爱,生活就会变得无比的光明与美好。现在,面对人际关系的变冷,个人至上的抬头,作为强势媒体的电视,应充分利用其巨大的影响力和渗透力,对我们民族的仁爱、利他等优秀品德予以彰显,凸现出人性的光辉;而作为“社会良心”的电视工作者,则应该用抚慰人类灵魂的镜头,在挫折与磨砺中展现社会人生美,以颂扬至诚至善的伟大与崇高。事实上,有关人际关系、道德情操等题材的电视节目,只有具备深刻的人性价值,闪烁着真、善、美人性光辉,才可能具有思想的深度和感人的力度,才会为广大群众所喜爱。山东电视台摄制的《壁画后面的故事》,最能说明这一点。这是一部纪录片,讲述山东建筑工程学校教师、壁画家刘玉安,创作了异型榫合陶板浮雕壁

画《和平、进步、自由》,得到有关专家一致好评的事故。特别是对壁画中那位英俊的牵马男青年形象,大家更是倍加赞赏。这一艺术形象是刘玉安以自己的学生陶先勇为原型创作的。陶先勇长得英俊潇洒,身材魁梧,体魄健壮,青春勃发,充满阳刚之气。在刘玉安眼中,这“简直是上帝的杰作”,“生命美的化身”。因此,当陶先勇突然遭受病魔袭击时,刘玉安就义无反顾地挑起了救助陶先勇的重担,从筹钱、买药、上医院、背陶先勇进澡堂洗澡,到给陶先勇做生日、安假肢、带他到北京天安门观光等等。电视节目充分展示了人间自有真情在的美好情境,给人以心灵的感动。这个节目独具个性的是编导没有停留在助人为乐这个层面上,而是上升到哲理的高度,通过一个艺术家的审读视角,来说明“生命就是美”、“关爱生命就是为了美”;用一个艺术家的心理体验,强调美的永恒在于人们的携手共创,在于同心协力抗拒丑恶。这就不仅让观众从情感上获得了审美的愉悦,而且引导观众对壁画后面的真实故事进行理性的思考,将深刻的人文内容和鲜明的个性抒发完美统一起来,使节目具有了诱人的艺术魅力,从而有效地激起人们热爱生活、关爱生命的热情,去努力谱写更为壮美的爱的颂歌。所以,让关爱与和谐温暖人间,把猜忌与仇恨驱逐世外,使生命更加美好,这是作为社会文化形式的电视,理应承担的一份社会职责,也是电视节目制作要坚持的又一个美学原则。

面对社会、人生、事业,个人的对垒力量实在是太有限了,所以人需要相互帮助与彼此关爱。但作为社会的人更需要的是理想的支撑。所以,作为大众艺术的电视,把生活美、人性美和艺术美提供给观众的同时,还必须用理想美来启迪群众。因为理想是人类对自身完美生存状态的一种追求。它犹如火炬,照亮前程;犹如路标,引人走出沼泽。有了理想的指引,现实中的挫折、困苦与遗憾,都将变成一个短暂的过程,化为生活长河里一朵小小的浪花。因此,高文化品位的电视节目,总是在求索与奋进中展现社会理想美,以激发人们奋进的勇气与对胜利的信心,在体现理想之美方面,都有着自己明确的追求。

《西藏的诱惑》是介绍西藏自然风貌、风土人情和宗教艺术的一部电视风光片,但它又高出了一般的风光片,就在于它抓住景物的内在特征,拍出了自然风貌的神韵,那一幅幅扑面而来的淡雅而纯净的画面,让无数观众为之倾倒。不过,更主要的是编导在客观纪录的同时,深深寄托了自己的情思,渗入了浓重的主体意识,着力于意象的表现和主观情感的抒发,将客体世界与主体意识融为一个整体,创建了属于自己的叙事套路。整部片子以三代宗教僧侣虔诚地跋涉在朝圣路上为经线,以四位艺术家虔诚的艺术追求为纬线,将神奇秀美的西藏风光编织在一起,歌颂和赞美了那种朝圣精神:“人人心中有真神,不是真神不显圣,只怕半心半意的人”,以及追求目标的那份执着。编导采用这些富有启示性和寓意性的镜头,用意在于提醒观众深思:这不仅仅是宗教信仰徒和艺术家们的一种精神,而是人生的一种境界。人人心中都有“真神”,这“真神”就是理想和信念,人人都要

有为去追求、奋斗的意志和毅力,达到“极顶”,找到“源头”。正由于《西藏的诱惑》对理想、信念、追求进行了如此生动的展示和深入的开挖,就使它同时具有了文化价值、审美价值和哲学价值。这充分表明:受欢迎的电视节目,不管采用什么形式,而提供给人们的,总是寄寓着一种曙光在前的希望,蕴含着一种催人奋进的力量,具有巨大的艺术张力。因此,在困苦中预示美好,在黑暗中显露光明,在抗争中展现希望,给人以生活的信心与前进的勇气,张显出人的无穷伟力,这就是制作电视节目要坚持的又一美学原则。“再现生活”的纪实类电视片,需要对生活纪实画面进行集中和升华,以理想与信念鼓舞人,使人的精神得到陶冶;“表现生活”类的电视剧,创作者更应该通过自己的独立人格和严肃认真的对待社会、人生与自我的态度,以高尚的思想来塑造人,使人的灵魂得到净化,始终让人们觉得有理想在指引,让人们看到希望。其实,一部成功的,有影响的电视剧,创作者除了具有严肃的问题意识、对于社会现象独特的审视意识外,还必须在作品中创造出理想化的人物,如《绝对权力》里的齐全盛、刘重天,《至高利益》里的李东方、贺家国,以及《苍天在上》里的黄江北,《新星》里的李向南等等,只有写好了这些有人格,讲正气的人物,像《绝对权力》的作者周梅森所说的那样,“树立一个理想的标杆,一个榜样”,<sup>[2]</sup>认真展示出光明与希望,电视观众才能从精神上得到极大的审美愉悦,找到理想美的寄托。

过去,由于极左路线给文学艺术造成了极大的伤害,矫枉过正之下,一些人刻意回避理想,消解信念,瓦解崇高,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以游移多角代替坚贞专一,以平庸代替崇高,以适应和迎合代替追求和引导,以突破“高大全”为理由不断把人物推向低俗、小气、褊狭。为此,我们要呼唤我们民族的伟大奉献精神,推崇我们曾经有过的理想英雄情结。当前,商品经济大潮,给电视带来金钱至上,趋时媚俗等负面影响,造成审美方向的偏离,我们更需要强调电视媒体的社会使命感,正确处理好电视节目的思想性与商品化的关系。这是时代对电视工作者提出的一项艰巨任务,也是制作电视节目必须要坚持的一个美学原则。

随着改革的深入,电视机构开始直面波诡云谲的商品市场,由“单一经营型”向“多元经营型”转换,电视节目的制作,也就不仅是文化的,同时也是商品的了。这一转轨,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它给电视行业带来了新的挑战与机遇,不仅增强了广大电视从业人员的危机感与使命感,而且有效地解决了电视运作中经费的不足,增强了自身的“造血”机能,但更为重要的是及时抢占了文化市场份额,让观众看到越来越多的好看的电视节目。比如湖南电视台,他们的改革由湖南经济电视台开始,该台从银行贷款2800万,第一年还本付息,还创收3000万,第二年创收6000万,第三年创收9000万。经过几年努力,湖南电视不仅大产业的态势已经形成,而且创制出“快乐大本营”,“玫瑰之约”等受观众欢迎的电视栏目和节目。而随着电视业市场运作的全面展开,我国的电视文化理念也发生了由“宣传”到“传

播”的嬗变。这是社会民主化进程得到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使我国的电视从业人员获得了思想的解放、思维的发展和创造力的迸发,使我国的电视屏幕变得更加丰富多彩,电视传媒功能更趋多元化和立体化。事实证明,从“宣传”到“传播”,就是从主观的思想灌输,到与人的平等交流;从耳提面命式的教化,到润物细无声式的感化;从单一的喋喋不休,到让普通人表现自己的感情和思想。总之,这种新的电视文化理念,使荧屏传递的是多种声音,特别是普通老百姓的声音,展现的是多元文化视角,表现的是一种宽容和理解的坦诚对话。所以,由“宣传理念”趋向“传播理念”,并不意味着社会意识形态的淡化与消解,更不是社会良知良能的减弱,恰恰相反,是要将弘扬主旋律和社会道德引导,通过主体性情的涌流,注入电视,变成一个个具体鲜活的节目,以满足人民对于高尚的电视产品的文化需求。对于这一点,即如何处理社会使命与市场竞争的关系,重庆电视台台长根据他们实践的经验,作了很好的回答,认为二者在本质上是统一的,因此他们的理念是:“公益为本,经营为用。”<sup>①</sup>遵照这一原则运作的结果,他们获得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丰收,拥有了一批批思想内容好、收视率高的电视节目。相反,如果缺失了正确的道德评判,尽管画面诱人,音乐幽雅,叙事水平高,但这样的电视节目仍然会像患上佝偻病似的站立不起来。2000年播出的《大宅门》,从艺术上看,是一部制作精良的电视剧,但是正如刘晔原先生所说:“既没有表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子,也没有体现先进文化的发展要求”,剧中着力歌颂的创业人白景琦,“行为如同恶霸,利用不正当的手段兼并同行,而且要杀个干干净净。他所奉行的大道理是:做一件事要是别人都乐意了,就我自己不乐意,那多没意思呀。他奉行的小道理是:什么账都可以欠,只有逛妓院的账不能欠”如此等等,这就“损害了作为一部优秀剧所应有的思想内涵。”<sup>[3][145]</sup>这话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欣赏电视剧(当然也包括其他电视节目)是一种审美活动,而审美活动实际上是充分体察人的本质力量的一种活动,作为精神存在物的电视节目,其终极关怀在于人的自我发现和自我肯定。如果连人的“自我”和“生存价值”都被曲解甚至被否定掉了,这样的“存在物”对世人来说,又有多大的价值呢!所以,充分展现社会人生美,强调生命的价值与意义,颂扬人性的伟大与崇高,倡导关爱与奉献精神,引导人去思索人生与追求真理,这是电视节目的灵魂,也是电视节目必须具有的美学品格。

## 二、生活真实美与意象物化美

我国电视节目的分类,总不外纪实类与表演类这样两个大的系列。“再现生活”的纪实类节目,如新闻片、专题片、纪录片等,追求的是生活的客观真实,是一种“存在性”

<sup>①</sup> 见2006年8月24日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节目:“台长论坛:说中国电视”。

的真实;“表现生活”的表演类节目,如综艺节目、娱乐节目、电视剧等,追求的是生活的艺术真实,是一种“假定性”的真实。尽管二者的追求不同,性质不一样,但要求所反映的生活必须真实,则完全是一致的。所以,真实性是电视节目的生命。著名电影美学家巴赞就说过:电影“是对现实的精确纪录”,是“机械复制现实的幻象”。克拉考尔也在自己著作的封面上赫然醒目地写着:“电影的本性——物质现实的复原。”<sup>[4] (P312)</sup> 对这两位美学大师所提出的“真实性”原则,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我们应该有一个全新的认识。事实上,用先进的电子技术武装起来的电视,已经修正了对存在世界“复制”和“复原”这一理论的概说,在实践中也彻底模糊了纪实作品与表演类作品的美学区界。现在,西方不少电视台将“新闻故事化”、将“故事日常行为化”的努力,不仅赢得普遍的赞誉,争取到了更多的观众,而且有效地充实了电视“真实性”的美学内涵,使直录与创作、主体与客体、个别与一般、现象与本质,能在一个电视节目里有机地融合成为一个整体,从而大大提高了电视的艺术表现力。如形式近于表演,内容近于纪实的谈话类节目(talk show 香港译为“脱口秀”)以及西方的“肥皂剧”之所以兴盛不衰,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与电视人对“真实性”这一电视美学原则的全面深入理解,将纪实与表演相互渗透,不是没有关系的。新闻片的主观创作,最典型的莫过于上世纪50年代初美国电视台对麦克阿瑟访问芝加哥的一次实况报道。据美国社会学家库尔特·朗和格拉狄斯·朗夫妇说:电视中出现的场面与当时情况完全不同。他俩的调查表明,当时现场群众在熙熙攘攘的混乱中,能够看上一眼乘车而过的麦克阿瑟,但并没有把他当作偶像来崇拜,大部分时间,现场群众不过是由于场面的混乱而引发了兴奋的情绪。但在电视荧屏上,经过精心的机位安排和镜头组接,麦克阿瑟始终占据中心位置,而且形象崇高;在他周围则是充满对英雄无比敬仰的沸腾的人群,整个场面浩大而动人。这同真正的现场气氛毫无共同之处。朗夫妇因而称这次电视新闻报道为“精心编排的戏剧”。<sup>[5] (P16)</sup> 其实在通常情况下,电视节目中的客观真实与主观意象也往往是合二而一的,因为无论那类电视节目,都是经过编导、摄影师创作出来的作品,既然是作品,就肯定注入了诸多的主观因素。这道理很简单,因为只要将镜头对准一个物件,取景框就是对现实完整空间的切割和选择,就是对现实生活中某些东西的删除或渲染,就是创作者在捕捉符合自身意愿的审美物像,就是一种主、客观的融合,其结果必然是“存在性”真实和“假定性”真实的统一。所以,如何以客观存在为依据来充分展示生活真实美与意象物化美,通过虚实互补来提高思想品位和艺术品位,是制作电视节目时要认真把握好的一个美学原则。

为此,电视工作者首先必须要树立正确的审美理想,满怀激情地深入生活,去发现美点。只有这样,主体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才会具有深度,创作时才能把准虚实互补的度,使生活真实美与意象物化美有机地统一在一个具体的电视节目里。而对于电视编导来说,只有在自己熟悉的生活范围

内,才可能寻找到有价值的、精美的选题,才能通过审美意象反映出真实的生活。这正如《西藏的诱惑》、《天驹》等名片的摄制者刘郎在《西藏的诱惑导演阐述》里所说:“创作这些片子的过程实质就是我在寻找自己优势的一个过程,这个优势,就是自己的文化修养与西部生活、西部题材的契合点。找得越准,片子也才越成功。”这经验之谈,不仅说明有了生活就有了自己的优势,而且还说明个人的思想、文化修养与解读生活的关系,以及在创作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也强调了生活是创作的源泉,个人的思想、文化修养,是发现美点、处理好生活素材的原动力。换句话说,审美理想指导审美创造,主体有了明确的对于美的事物的要求和渴望,才会对客观世界中存在的美特别敏感,产生强烈的创作欲望。现在,电视编导拥有相当大的对创作进行自由选择的权利,那么,加强生活积累,提高思想水平,提高文化素养,就更加显得重要。如果没有一个正确的“思想视点”牵引,那对生活就不可能作出全面、深入的认识,其结果不是造成在阐释生活时曲解民族和时代的精神,就是整个节目提不起、立不稳,成为一堆没有多大意义的“拼贴画”,都会失去生活的真实。如果没有丰厚的生活积累,一味围在桌边侃故事,拍着脑袋搞“策划”,这样制作出来的节目也可能只剩下自我欣赏和自我陶醉的份。其次,电视工作者在整个审美活动中,要真正做到心贴群众,热爱生活,传播美点。人民群众是社会前进的动力,这是早已被历史证明了的。深入生活,实质就是走向人民,热爱人民,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以他们的欢乐为欢乐,以他们的疾苦为疾苦,只有深含这种情感涌动的电视节目,才会具有诱人的魅力。例如2006年8月四川电视台播放的电视连续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就是在正确的审美理想指引下,拍出的一部好片子,它没有惊险、曲折故事情节,也没有宏大、花哨的场面,又是旧片重播,但仍吸引了不少观众来再次欣赏,就在于它具有深刻的生活真实美,准确表达出普通老百姓喜怒哀乐的真实情感,思想视点与群众的生活律动合拍,所以它动人、它永久。再次,电视工作者必须要明确整个美的创造过程,是在审美理想的烛照下,对客观事物进行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审美把握和加工改造。对创作主体而言,要从客观世界中选取具有普遍、深刻的社会意义,能代表生活的本质和方向的对象物,来表达主观意愿,以符合于审美理想的目的,这就叫“合目的性”;而在美的创造过程中,遵循电视审美创造的一般形式规律、结构规律、表现规律,将生活真实美与意象物化美完美地统一起来,达到事实真实和意义真实的美学效果,这就是“合规律性”。因此,广大电视工作者必须高瞻远瞩,提炼生活,美化美点。生活是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但生活的本身并不是艺术。正如上所述,生活需要美的创造意图去把握,素材需要通过审美理想去进行加工和改造。这就要求我们既要警惕以“前卫”、“实验”的名义曲解生活;也要防止在“真实”的旗帜下滑向自然主义,不敢对生活原生态的真实作出自己的选择、加工与提取,不能透过生活原生态的纷繁表象,去探究其深层的本质真

实,而是停留在“原生态”的表层,满足于表象真实的纪录,结果成为五彩斑斓的生活表象的俘虏,被其所异化,使美的创造力削弱,使道德感、责任感、崇高感、历史感等都随之湮灭。所以,在审美理想指引下,对生活素材进行合目的性的筛选,按电视制作规律进行有效的加工,将主体的意图形象化,形象组合的含义深刻化,使主体与客体有机融合,生活真实美与意象物化美和谐统一,这样,电视节目就会具有较高的文化品位。

可见电视的“全息性”并不等于杂乱无章地将所有的“生活”一股脑全搬到荧屏,而是运用先进的电子技术,自由展现时空,去创造一个无比丰富多彩、有声有色的艺术世界。这种经过集中与提炼、具有普遍意义的生活,才能使观众觉得触摸到生活在自己身边的你、我、他了,从而产生一种真实性和参与性的审美效果,获得一种亲临其境的审美享受;也只有这种将主观意象与客观物象、主体性情与客体存在有机组成的“生活”,才能满足当今社会那渴求“真实”、崇尚“实际”的文化心态,建构起人们心灵的家园。当然,人的心灵世界犹如天空中无比深邃的“黑洞”而不可探测,但生活在同一文化范围内的人们,总是会具有相对一致的审美价值取向。所以作为大众文化的电视,就必须切实遵从群体的审美心理需求。所谓电视节目的本土化,电视频道的专业化,其实都不过是让电视节目更贴近自身赖以生存的“群体”的一种努力,这也就是从“广播”到“窄播”成了电视发展方向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在当前,对电视节目的定位,还是专心于贴近普通民众,服务于普通民众,会更符合于我国目前电视生存发展机制的质的规定性。例如广东电视台的《外来媳妇本地郎》,播了一千多集,保持连续6年的高收视率,就在于这个节目讲述的是普通民众身边的故事,与普通老百姓的审美心理需求相吻合。这一成功经验给了我们诸多的启示:电视节目要提升自身的品格,要有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就必须认真调查和了解广大观众的审美心理,首先要针对人的精神生活中总有企图改变平静,追求奇异的心理特征,努力将人们熟知的对象进行加工处理,使人对其产生陌生与新奇感,以满足人们追新求异的审美心理需求,尽管诸多心理欲求对电视节目的期望值不尽一致,但只要予以正确引导,借助镜头的演绎,以求实的态度,展现事态的始末;以理性的思考,提示问题的本质;以鲜明的情感,直面人生百态。就可以使人们在画面和光影的幻化之中了解世界,看清自己,咀嚼人生,体味美丑;就可以在真实美与意象美所构成的“这一个”虚实相生的“真实”生活里,获得心理欲求满足的审美快感。

### 三、直白浅切美与深蕴含蓄美

电视是由现代科学技术和最新的传播技术,以及最先进的制作手段武装起来的一种新型艺术。在现代生活中,看电视已成为人们不可缺少的一个内容,上至专家教授,下至文盲老妪,几乎都可以在电视节目中找到自己恰当的位置。这种“电子四海一家”的社会属性,一直牵引着电视艺

术在大众化的道路上迅跑。

现今,快速的生活节奏和巨大的竞争压力,使人们迫切需要一块能松弛神经、调节情绪的休憩地。当经过一天紧张、繁忙的工作、劳动之后,看电视自然就成了人们一种便捷、廉价的娱乐休闲方式,成为人们获得温馨与平和慰藉的精神乐园。所以,这时电视节目给予观众的,应该是一种静谧安详的、轻松愉快的审美享受,这也就是制作电视节目,必须充分考虑人们休闲和娱乐的需要,走大众化道路,坚持直白浅切的美原则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看电视不同于观赏戏剧和电影,它一般是在家里,于茶余饭后的空隙时间,才围坐到电视机前来放松放松的。这种自由闲散的氛围,也就造成了观赏的时断时续。所以,电视节目怎样做到叙事线索前后的相互勾连和叙事单元的独立性,因果关系的上下照应和娓娓道来的层进性,以及画面语言的鲜明醒目,声音语言的简括入耳,造型语言的通俗独特等等,这些直白浅切的美学原则,就成了电视工作者在艺术上的一种执着追求。

另外,从古到今,不分中外,娱乐从来就是人的一种本能需求。对于儿童来说,玩耍嬉戏是重要的学习过程;对成年人来说,休闲娱乐则成了保持心身健康的有效方式。所以作为大众化艺术的电视,将娱乐性视为一种不懈的追求,也就成了十分自然的事。但这绝不是无遮掩、无顾忌地去直现世俗的低级趣味,以博取廉价的一笑;或者是鹦鹉学舌地直述某些污语秽行,以满足官能的刺激,因为这类所谓的浅切直白,只不过是一种低下与浅薄,是以牺牲文化的口味来换取非文化的纯娱乐性为代价的,应该坚决予以摒弃。我们所要坚持的,则是以创作者高尚娱乐观念的艺术化和视听表现的大众化为前提的一种美学原则,它在于以直白浅切之美,去拉近电视与普通观众的距离;以健康向上的思想观念,含而不露、潜移默化的方式方法,去净化人的情感,陶冶人的精神。换句话说,就是以直白浅切与深蕴含蓄之美,来提高电视艺术的格调与品位,制作出更多的电视艺术精品。

为此,首先就必须要加强媒介思考的力度。特别是在当今感性膨胀、娱乐风行的媒介环境中,只有那些具有理性思考的深度,具有严肃探究精神,善于条分缕析、厘清事物本源的电视作品,才会令人感到异常的兴奋;只有在反映生活的广度上视角独特,挖掘出素材的本质内蕴,善于求索事物发展规律的电视作品,才会使人产生由衷的敬意。2006年中央电视台二套播出的《大国崛起》,就属于这类作品。它将许多大家熟知的素材,以“国家兴衰”、“世界进程”这样的大问题统领起来,进行了重新的编排与组合,从而显现出不平凡的意义,具有一种特殊的媒介理性价值。它不仅将历史考察与现实关怀相结合,而且将抽象的思想观念与具象的电视呈现有机地融为一体。这就不仅引导观众在500年的时间跨度中,冷静反思人类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和认真探寻国家兴衰的客观规律,而且让人们在对历史、对国家、对民族前途和命运的热情关注中,获得了审美愉悦。据有

关报导,仅用网络搜索工具,就可查到对该片近70万条的报导和信息,由此可见媒介的理性影响力和该片受大众欢迎的程度。

其次,要深入地优秀传统文化学习。中国传统美学中,那真诚的直白和浅切的表述,那深蕴的旨趣和高远的情怀,那以形写神、清新淡雅的意境,那虚实相生、以简驭繁的技法,那昂扬向上的格调和生生欲动的气韵等等,都是有待于我们去发扬光大的。我国的电视艺术,在民族化的道路上已迈出了坚实的步伐,涌现出了许多深得传统精髓、深受大众喜爱的好作品,如《秋白之死》就是这样一部雅俗共赏的电视剧。剧本紧紧围绕着瞿秋白的被捕、就义来展开故事情节,被捕之前写实,叙述直白浅切;被捕之后写意,手法蕴藉深邃;就义前和就义后的叙事描写,则更是寓意高远、韵味无穷:一片绿茵茵的草地,刽子手举起枪来,但是,屏幕上并没有枪声,而是代之以悲壮的合唱;接下来就是飘浮树叶的定格(凝固),飞翔小鸟的定格,急湍瀑流的定格。然后,一团祥云将瞿秋白遗体托上了蓝天。这种意在言外、计白当黑的大写意,就不仅生动、深刻地交待了秋白牺牲的过程,而且是在诗意的表现某种意念、情感和思想,从而大大深化了主题,对秋白之死作了最崇高的礼赞。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在前段时间里,一些编导往往是抱着猎奇的心态去返古的,热衷于演绎宫闱秘史,或戏说遗闻轶事,结果弄得长辫子、马蹄袖充斥了屏幕。尽管这一现象已有很大改观,但如何古为今用,怎样继承和发扬传统,仍然是任重道远,我们应责无旁贷地担当起这承先启后的责任。

其三,要充分发挥电视时效性的特有动能与张力。大家都知道新闻片要有时效性,却往往忽略了其他电视节目在反映生活时,也要充分利用电子传播快速敏捷的优势,及时对各类社会问题作出回应,这样才能充分体现出大众媒体的美学价值。所以,时效性不仅是电视生存发展的基本理念,也是电视服务大众的一种需要。

当今世界,日新月异,变化神速。电视艺术如何适应这种变化,以满足大众的精神文化需求,特别是如何帮助那些对新生活感到兴奋的、震撼的、犹豫的、不知所措的人们,去找到解读的答案和获得心灵的慰藉,这样,时效性原则就显得格外的重要。事实证明,只有抢在大众翘首期盼的那一刻,同步将节目送到大众面前,才会受到大众的热烈欢迎。

产生轰动的社会效应。譬如当下有些“反腐片”,就其艺术造诣而论,并无特别创新之处,但由于它与广大群众的所思所虑、所恨所爱、所求所盼相吻合,具有时效性,所以往往一出手就走红。这里,请再看2007年2月18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的报导:在湘西花垣,这个地处偏僻山区的国家级贫困县,有一位收废品的农家妇女,名叫田京珍,尽管她自己过着艰难困苦的生活,却长期义务照看因父母外出打工,而留在家中无依无靠、四处流浪的两个年幼孩子。同情心、爱心、责任心,促使她要将深埋在心中的话语倾吐出来,宣示于众,于是自编自导了一部《千里寻母记》的电视剧,故事就是自己的亲身经历,演员就是生活中的真人,道具也是左右邻舍凑合的现成家伙。但就是这样一部连化装都是用“锅墨烟”来代替的电视剧,却十分感动人,拍成后受到了乡亲们的热烈欢迎,都说这个好看,让人掉泪,替我们说了心里话。我想其中奥秘就在于“时效性”所特有的动能与张力,才使这部电视剧飞了起来。所以尽管它土得掉渣,浅白得如叨家常,但却充满了真情实感,对亿万农民进城出现的生活缺失,进行了即时性的反映,触摸到了大众关注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这又能说它不深刻么?当然举这个事例的目的不是要我们放松电视对艺术造诣的执着追求,更不是有意贬损艺术技巧在电视节目中的巨大表现力,而是要我们认真去重新理解大众艺术的本质内涵,去思考大众艺术如何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从而使我们能制作出一批又一批高格调、高品位的电视节目。这绝非泛意识形态化的政治术语,而是电视美学的本质要求。

#### 参考文献:

- [1] [美]戴安娜·克兰.文化生产:媒体与都市艺术[M].赵国新译,译林出版社,2001.
- [2] 高小立.周梅森从大处说[N].文艺报,2003-11-06.
- [3] 刘晔原.电视剧艺术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 [4] 高鑫.电视艺术美学[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
- [5] 苗棣.解读电视——苗棣自选集[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栗世来)

## Several Aesthetic Principles in TV Programming

YIN Li

(Sociology Department,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3, China)

**Abstract:** TV is a social culture, and its ideological nature determines that it should fully reveal the beauty of social life. This requires that TV program producers should put it into the initial position to eulogize the social cantus while putting their individual style into full play to demonstrate the beauty of society and life. Also, TV program can be said to be the rebirth of some filtered image, so TV programming should stick to the aesthetic principle to fully demonstrate the beauty of true life and imago. Further more, TV is a mass medium, which requires the program producers to learn from the excellence of national tradition, and make full use of its advantages to meet the mass demand for culture.

**Key words:** TV; programming; aesthetic principle